**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刘 同 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58)

**摘 要:** 人类文明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具有一致性,判断文明形态演进的依据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状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变迁看,实践的发展决定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人类实践的高度,是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从人类文明秩序的形成看,人类文明秩序既不由先验理性所设计,也不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自然演化,而是受到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蕴含着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以对"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为内驱动力,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追求平衡和充分,在生产关系的构建中凸显人的主体性,力求以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依据;生产方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1-000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①。这一论断既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也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宏观指引。学界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有学者从东西方文明对比的角度,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价值内核上的优越性②;也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论述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全球治理的引领意义③。这都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内涵以及意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立足学界丰富的学术成果,我们需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前提性反思,追问判断文明形态"新""旧"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④。从历时性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从共时性角度看,生产关系规定人类文明的内在秩序,生产方式的迭代是判断文明形态"新"与"旧"的内在依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在于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 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

判断人类文明形态的"新"与"旧"需要立足文明变迁史,在历史的纵深中拨开文明纷繁复杂的表

**收稿日期:**2022-12-10
**作者简介:**刘同舫,男,湖北天门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9ZDA003)。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24 页。

② 参见田鹏颖:《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③ 参见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0 期,第 1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 页。

象,探寻推动文明变迁的内在动力源泉。文明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作为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现实呈现方式,其发展的本质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的提升。将生产力发展与文明变迁统一起来,以生产力的进步为线索,重新审视和探究文明变迁的历史图景,能够实现对文明变迁历史的总体性把握。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只能以空泛静态的观念把握文明,通过"野蛮"作为对应物以反衬出"文明"的内涵。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曾用"文雅教养"等词语将辉煌灿烂的希腊文明与周围野蛮人相区别;中国人则用"礼仪之邦"来标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及与蛮夷民族的差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交往日益频繁、世界交往逐渐密切,原来封闭于某一区域的文明开始接触到与自身不同,却同样具备"教养"与"礼仪"的文明。在对本民族文明变迁历程的梳理和不同民族文明变迁过程的对比中,人们逐渐丰富了关于文明内涵的认知。不同时期的思想家立足自身的时代特点赋予文明以不同内涵:孟德斯鸠认为文明是民族的精神;米拉波认为文明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体现为人口、自由和公正的提升;斯塔罗宾斯基认为文明是个人、国家和所有人类走向教化的过程和结果;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是范围最大的文化实体,是涵盖范围最大的"我们"①。思想家们从价值观、精神以及共同意志等角度展开对文明的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但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无法透视精神和价值背后的物质动因,也无法将整个人类文明史作为相互关联的环节进行整体考察;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以文化之间的差异凸显文明之间的对立,以多元文明观消解线性文明观,在排斥意识形态冲突的过程中弱化了文明内蕴的共同发展动力。笔者认为,对文明变迁史的把握需要分为两个层次:在现象上认识到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性,在本质上把握到作为整体的文明历史内蕴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形态论是对文明变迁史的经典论断,以人的存在状态为线索,从现象层面阐述了各文明阶段的特征以及文明变迁的总体趋势。"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②。当社会形态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时,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人只有与他人保持高度直接且明显的联系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奴隶制时期,奴隶的生命隶属于奴隶主,奴隶根本不具备任何形式和实质上的自由,只是会劳作的工具;在中国传统宗法制中,人的权力与义务建立在家族内部的人身关系之上,宗族礼法中生存的人终身无法逃脱宗族限制,这种限制也是他们能够在宗族林立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保障。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文明展现出赤裸和分明的等级特征,个人的平等、自由意识与能动性在极大程度上被遮蔽,称为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在形式上获得独立性,人的一切"类联系"被扯断,家族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各种基于人身依附而建立起来的利益都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③。私人利益是社会存续的基础,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进而导致人成为双重属性的存在物:在政治国家中人被视为社会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沦为工具。这一阶段,人尽管获得了形式自由,但实质上是对物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性既体现为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抽象统治,物的生产与消费逻辑支配人的交往方式,每个人都成为生产与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符号,"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④;同时也表现为伴随庞大的商品堆积,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量的人被迫成为一无所有的

---

① 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3—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0 页。

无产者,在市场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得生存,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一发展阶段被称为资本主义文明,典型特征是商业与工业互为表里,共同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人只有在作为劳动力商品时,才得到买卖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人不仅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与自由,更在实质上发展着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人和人的关系不再是以冲突和对立的私人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一发展阶段,发展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是为了维系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与每个人自由且全面的发展。

以人的存在状态为线索,在现象层面把握文明的总体变迁史,是在本质上把握文明变迁深层规律的前提。从现象上看,人类文明的变迁似乎呈现出不断突破束缚走向自由的进程,黑格尔将这一现象的本质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②。黑格尔拒斥对历史做切片式研究,试图以唯心主义辩证法终结以往哲学对历史形而上学的解释,把绝对精神的展开与复归视为人类文明的变迁依据与动力,由此实现了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他的这种统一方式使得历史不再是各种僵死范畴的堆砌,而是一幅整体性的动态图景,这种统一方式也将文明变迁的动力导向“神秘主义”,消解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人成为受“绝对精神”支配的客体。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人类文明的变迁在现象上确实呈现为不断突破束缚走向自由的整体性进程,但这一进程的内在本质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上帝一般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与复归,而是人通过实践创造历史、创造精神、创造文明。

人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文明的直接前提,人通过物质的生产实践所展现出的处理自身与自然矛盾的实践能力被称为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人类实践的高度,是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正如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④。原始社会的关键特征在于人们“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⑤,尽管存在通过人工产品和人的活动去增加天然产物的产量,但收获的产物并没有达到能进行原始积累的程度。伴随耕种技术的提升以及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出现分离,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产品出现剩余,私有制萌芽。与此同时,吸纳劳动力进行生产以实现财富增加成为部落壮大的首要途径,正如恩格斯所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⑥,人类开始进入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前资本主义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的迈进“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⑦。英国在 18 世纪完成的社会革命,促使其率先摆脱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尽管这一社会革命的酝酿肇始于大航海时代世界市场的开辟,但真正推动社会革命进程的是蒸汽机、珍妮纺纱机以及机械织机等新型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社会生产工具的发明与革新及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才是催生英国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随着先进生产工具在各行各业的广泛使用,传统组织生产的方式已经不能充分发挥这些先进生产工具的力量,资本主义大工厂制度开始形成。工业在英国蓬勃兴盛,其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日益凸显,在工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阶层社会地位迅速上升,原有封建贵族的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57—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180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02 页。

地位逐渐下降。在私有制基础上,工业的强大力量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成为支配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工业,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各主体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变得无所不能,“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熔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①,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建立。正如资本主义文明的建立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样,资本主义文明的消亡也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逐渐难以支配自己体内的强大生产力,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必将从资本主义内部生长起来,成为扬弃资本主义文明之后的产物。这一文明形态能够克服资本逻辑,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强大生产力,其终极旨归将是创造出使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共产主义社会。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线索考察人类文明的总体变迁,从本质上揭示出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文明变迁的历史不是精神和意志自我运动的结果,不是无规律和神秘的历史运动,而是以唯物主义的、有规律的历史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对文明变迁加以历史图景式的把握能够标明当下的历史方位,反思历史过往的经验教训,激发当下历史主体的主动精神。然而,对文明变迁历史的总体性把握并不能代替对文明内在秩序的探究,需要进一步追问:每个文明阶段的生产力以什么方式规定文明的秩序?

## 二、“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生产关系与人类文明秩序的内在规定

人类文明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具有一致性,人类文明秩序往往通过社会秩序显现出来。恩格斯曾在《英国状况》中将文明视为“社会的素质”,他通过对比 18 世纪完成社会革命的英国与同一时期仍处于封建统治状态的西欧各国的社会秩序,声称“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③。恩格斯以“社会的素质”代指文明内部的秩序,凸显了文明的社会属性,他将“社会的素质”置于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加以阐释,凸显了生产关系对文明秩序的内在规定。

学界对规定人类文明秩序的本体存在诸多争论,以罗尔斯为主要代表的学者,沿着康德的先验理性思路,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内核,强调人类文明存在的各种秩序植根于人的理性设计。康德作为建构主义的集大成者,以先天综合判断为逻辑起点,强调人先天具有的理性能够对各种感性直观进行判断和整理,“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导源于感觉或直觉,而是在理性、在知性中有其渊源”④。理性因自身具备的先验性,承担起建构知识、建构道德、建构社会制度的重任。罗尔斯继承了康德的理性建构主义原则,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根据正义原则对各种制度做出评判,对于各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⑤。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制度并不是天然的实存,也无法自然而然演化出来,而是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主动设计和建构的结果。这无疑肯定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使得理性成为社会秩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但以一种先验的理性作为社会秩序建构的依据,难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静止状态,无论是康德归纳的先验范畴还是罗尔斯基于原初状态推理出的正义原则,都表现出以非历史性的标准“裁剪”社会现实的“生硬感”。对理性的过于推崇与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忽视,使得建构主义无法揭示规定社会秩序的真正本体。

不同于建构主义者对理性的推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者认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设计”⑥。社会进化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97 页。
④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437 页。
⑤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⑥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7 页。

者通过对理性能力的否定和社会特性的分析,认为人不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更不能基于规律为人类社会制定发展道路。人类秩序从何而来? 哈耶克认为,如同自然界在渐进积累的过程中实现进化,人类社会的各种秩序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①,人们在选择和模仿中实现进步。在他看来,规划社会发展和建构文明秩序的想法和行为过于夸大理性的能力,违背秩序形成的过程,最终带来的只能是人自由的丧失和人类文明的陨落,因此他主张个人和社会应当充分自由地对文明秩序进行自然选择。哈耶克的论证与其说是学术观点,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宣传,他认为人不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却又将社会秩序的形成归因于“人的各自行动”,他否定对社会发展道路给予应然性的规定,却又认为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是个人的自由和政府的不干涉,他对理性有限性的论述不过是对怀疑论者观点的重新包装。他在建造自己学说之前就将双脚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意识形态的蒙蔽让他不想看到、也不愿意承认规定社会秩序的真正本体。哈耶克以形式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在本质维度落入了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的窠臼。

人类文明秩序既不由先验理性所设计,也不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自然演化,而是受到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蕴含了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生产关系首先指向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在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结合过程中,规定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言,“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②。其次,生产关系还包括建立在所有制关系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③,在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集聚、独立与分工的过程中,规定着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层级秩序。最后,生产关系还包括建立在所有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基础上的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在影响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的过程中,规定着社会交往秩序。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生产关系作为有机整体规定着文明内部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五形态论蕴含了以生产关系为本体探索人类文明秩序的理论意蕴。他以分工和所有制的变化为线索,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私有制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确立的所有制。“部落所有制”与生产力极度匮乏的状况相适应,只有实现生产资料部落共有,以需要的迫切程度为标准分配劳动产品,才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实现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部落内秩序呈现出完全平等的特征,族人无地位差异。“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在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分工已经完成、生产力已经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私有制成为社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部落间的战争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无生产资料的奴隶,社会分为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为了缓和两阶级间的矛盾,国家这一人类文明秩序的重要体现者得以出场,实现了“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④。而发展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阶段,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农民在成为封建主附庸的前提下获得了有限的自主性,整个社会秩序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呈现出等级分明的现象。农民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承受着层层盘剥的沉重苦难,现实中的无能为力促使他们寻求超自然的力量,推动宗教不断发展,最终成为笼罩在国家之上的庞然大物。

“现代私有制”生成于商业与工业的充分发展过程,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实现生产资料的高度集聚与商品市场的顺畅流通。但在实现这一目的的同时,事物本身的独特属性和意义被消解,

---

①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 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9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189 页。

代之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实现资本的增殖。自然界在资本面前不再具有崇高性,精神和文化不再具有神圣性,人与物相比不再具有超然性,在“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①,一切都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文明内部各种社会活动都以资本增殖为中心,遵循资本的安排。从社会结构上看,在资本不断增殖的过程中,社会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二者在抽象的人权上享有平等地位,然而实际的状况却是一切权力与地位集中于资产阶级,一切压迫和苦难倒向无产阶级,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的红利由资产阶级独享,而发展的代价却由无产阶级承担,社会秩序呈现出虚伪的平等。资本主义文明用其特有的生产方式将工业的强大生产力释放出来,将人从神权和专制所造成的分裂涣散状态中联合起来,将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连接起来。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是“抽象的人”,其追求的是资本增殖,这个阶段“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②。

共产主义既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运动,具备现实性和阶段性,“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状态,其在具备共产主义底色的同时也带有资本主义的沉疴。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力图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奴役状态,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由平等;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见物不见人”的窘境,克服人的异化,将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一进程艰难且曲折,但中国已积极迈出这一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力图以“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破除资本逻辑,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

从文明的历时性看,生产力的发展是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从文明的共时性看,生产关系是文明秩序的内在规定,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综合的生产方式则决定文明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是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生产方式,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不断深化“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在认识与实践的双重推进中力图消除生产力的发展桎梏以激发其深层活力,持续推进生产关系的更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现实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④。现实的人具有五重属性:作为具有动物性需求的自然存在物、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存在物、作为有意识生物的类存在物、作为超越当下的实践存在物以及作为具体条件下的历史存在物。⑤ “现实的人”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⑥,当然,他可能是自发的剧作者和盲目的剧中人,也可能是自觉的剧作者和主动的剧中人。处于自发和盲目状态的人们不能认识自身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受制于必然王国。为了克服自发和盲目的状态,人需要对自我的理性认识,既要认识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的丰富属性,也要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认识自身和社会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8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5 页。
⑤ 参见史英哲、刘同舫:《现实的人:马克思与福柯的论证维度》,《岭南学刊》2013 年第 5 期,第 12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8 页。

违背规律的实践进行纠偏，不断挣脱束缚人和社会的各种枷锁，在自我解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通达“自由王国”。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人的丰富属性和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只是作为劳动力和消费者存在，物也只是作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存在，人的丰富属性被遮蔽，“现实的人”无法实现自我认识，更无法实现自我解放。无论在资本增殖初期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或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财富占有的高度分化，抑或是当代资本与科技实现的深层次合谋，以资本增殖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在生产层面导致人的异化，更是在技术、消费、交往等层面对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异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百年历史不是一部资本增殖史，而是一部不断认识“现实的人”的丰富属性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力图改变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代之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关系。“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解放不能囿于抽象理念的框架，而需要把握社会领域的现实关系。首先，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运动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对社会力量和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及时分析和明确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交织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中，人不只是生产中的一环，更是作为文化、政治、自然以及社会中的一环，因而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并举。再次，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不断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层次齐头并进，贯彻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②。最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客观现实的。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在民生领域提出并坚持贯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③。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相较于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不能因为起步时的不完善而否认道路的正确性，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④。

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把握资本增殖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对自身历史使命的理性认识，始终立足人民立场，以充分发展的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增殖逻辑的充分认识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在对自身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历史使命的理性认知，贯彻落实于国家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战略。在资本增殖的自发状态下，不平衡既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手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以不平衡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倾斜和集聚，从而缩短周转周期，提升自身增殖效率，这种不平衡性既体现在各区域发展的进程中，也体现在群体的发展状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⑤在深入把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5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9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0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743 页。

资本增殖逻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既发挥资本在提升生产效率、促使生产要素涌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为资本增殖划定界限,引导资本向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和行业流动。为克服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克服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避免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中国的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明晰自身历史使命,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关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认识,力求通过硬性约束和软性引导等手段克服资本增殖在自发状态下带来的弊病,促使生产力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不仅体现在通过改变国内的生产方式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也体现在推动全球范围内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以全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理念,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便是开拓世界市场,促使各民族之间结束孤立发展的状态。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社会财富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流动,后发国家在生产体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扮演着被剥削和被压迫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所言,由资本主义文明所推动的全球化“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使得边缘受中心支配。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工业生产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欠发达国家要求开放技术壁垒,呼唤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积重难返,必须通过转嫁危机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冲突,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置若罔闻,这一畸形价值取向致使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认识到当前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全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文明在扩张的过程中带来的“中心—边缘”格局与“主从依附”逻辑,破解当前全球危机的关键在于破除旧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提升国际分工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以关怀世界范围内“现实的人”的宏大胸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实施“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以对各国人民的现实关切代替抽象空洞的口号,以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共赢代替零和博弈,以共商共治和共建共享代替霸权主义和强权压迫,努力与各国人民携手“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

判断文明形态“新”与“旧”不应当从文明现象出发,更不能囿于某一文明阶段的特征,而应该把握文明的整体性,依据文明内在的发展动力与规定文明秩序的本体两重维度对文明形态的“新”与“旧”展开反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变迁的动力源泉,生产关系是规定人类文明秩序的本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综合的生产方式的迭代是判断文明形态“新”与“旧”的内在依据。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是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既体现在主动追求生产力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力图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强大生产力,也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建构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主导的文明形态,是由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并具有历史主动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处于已完成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6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33 页。

态,而是处于不断创新发展的成长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开放的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开放的文明形态,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不断前行。

## The Internal Basis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Liu Tongf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han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ve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s.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forms li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productivity has directly reflected the height of human practice, being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chan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ord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has neither been designed by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ty nor evolved natural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free competition, but has been subjected to the internal provisions for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contains the unity of natural laws and subject sel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exploring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emancipation of "real people"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has pursued balance and suffici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highlighted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striven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ith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ernal basis; mode of production;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郭昌盛)